

苏联召开《发现美洲500周年：两种文明相遇》学术讨论会

1989年9月12日，苏联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历史问题》和《拉丁美洲》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即将来临的哥伦布首次抵达美洲500周年的有关问题。一些苏联拉美研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 关于“发现美洲”和“地理大发现”等术语问题。祖伯里茨基指出，“发现美洲”等是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术语，目的在于贬低美洲大陆当地居民的作用；拉美各国使用的是“两种文明相遇”，印第安人称“欧洲人侵略的开端”、“印第安人反侵略斗争的开始”，梵蒂冈史学家则称“向美洲开始传播福音的500年”。他认为两种文化“会合”的提法不一定恰当，不如说是两种文化“共生”。捷姆斯科夫建议使用《拉丁美洲》杂志所使用的术语——“拉丁美洲：多个世界、文化和大陆相遇”。谢洛夫坚持使用“发现美洲”这个术语。他争辩说，既使在新的多元论的观点中，也应给欧洲留有一席之地。古里雅耶夫坚持原来的提法，即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米高扬和阿里别洛维奇都认为，在选择某一个术语、定义时，不应担心这种选择会使某些人受到欺凌，而应该一贯地、始终不渝地沿着追求客观真理的道路前进。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伤害一些民族的感情，但是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当然是以正确的科学的形式说出。”

(二) 关于“发现美洲”的意义问题。与会者肯定“发现美洲”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卡尔梅科夫认为，这是人类进入近代史的序幕。“许多大的种族集团正是在这个时期彼此相遇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三) 关于研究拉美史的方法问题。与会者对此问题讨论得很热烈，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点：

一是要全面地、多层次地和综合地研究拉美史。里塔弗琳娜谈到，不研究中世纪西班牙，就不能完全理解拉美形成的是何种社会结构，它又是怎样形成的，那里的许多进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她说，主要的不是把西班牙与美洲对立起来，而是深入地、多层次地思索西班牙的封建制度和美洲前殖民主义结构结合起来的原因、因素、动机和内容。谢苗诺夫认为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属于边缘文化，伊比利亚—美洲世界是哈布斯堡王朝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伊比利亚—美洲世界中也沉积了巴尔干—多瑙河历史经验。他建议吸收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学家、匈牙利和奥地利历史学家参与一系列问题的全面研究。舒里果夫斯基强调指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美各国历史的许多方面必须加以重新研究。他认为，在这部历史中不仅仅有专制主义、宗教裁判所和蒙昧主义，还有体现在革命人文主义运动中的强大的人民的气

(下转第54页)

来联邦制在墨西哥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当然，墨西哥政治体制有它的特点和问题。它导致一种侧重联邦作用的联邦结构，不同于相对倾向州权的美国式联邦结构。除了上述四个联邦国外，在加勒比地区，由两个同名岛组成的圣克里斯托弗—尼维斯联邦国，在1983年独立前，与安圭拉曾被合并为英国的一个联系邦而施行“内部自治”。1983年，圣克里斯托弗的少数党不顾多数党的反对，与尼维斯的原先倾向单独建国的政党达成共建联邦的妥协，在取得英国同意和不曾举行独立前选举的情况下，宣告国家独立。两岛建成联邦，可能还怀有虚席以待相隔较远的安圭拉作为第三个成员参加的期望。诚然，拉美传统联邦制国家在政治生活的各个侧面仍尚未定型和不够成熟，这是人所共知的。倘用它们政坛人物常用的话来说，依旧需要推进政治民主化、“文治化”、法律化和制度化。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体制，但是，常言道“徒法不能自行”，其实，徒制也不能自行。看来，民主化、文治化和法治化三位一体，仍是拉美联邦制各国在目前社会经济形态框架内向前发展的政治要着。

联邦制国家结构，首先必须有邦可联，把五个根本不是“联邦”的政治客体误解为联邦，恰好犯了这种界限混淆的错误。汉译不改过来，将贻患后人。人们不应再托庇于“约定俗成”，长此将错就错。

最后，程教授表示，为翻倒顽案他乐此不疲，也算是一种应用研究。他不无遗憾地说：眼前有大堵的“约定俗成”的墙，但是，既然是“约”“俗”，虽已“定”、“成”，总可挽回。废约破俗持之以恒，定能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上接第48页）

息。他说，在客观地评价宗教因素在拉美各国历史上的作用时，必须克服气势汹汹的反教权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片面地叙述耶稣会士在这个地区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勃尔霍维奇诺夫认为，在谈到拉美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特点时，不应把当地因素绝对化。各宗主国给它们殖民地内各族人民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描述殖民化过程，既讲短处又讲长处。

二是必须从新思维的观点出发研究拉美史，防止简单化、图解化，消灭拉美史上的“空白点”，舒里果夫斯基号召历史学家站在新政治思维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发现”美洲前后的历史。里塔弗琳娜认为，封建主义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曾经在拉美存在过。但她反对把在拉美所发生的所有现象和进程都归咎于封建主义结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伊斯肯捷罗夫指出，在评价已形成的概念、体系时，有必要持谨慎态度，但对历史做简单化的图解已不符合历史科学的要求。这样作阻碍了历史科学的发展，不是鼓励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进程，而是人为地将历史事件以扭曲的方式套用事先设想好的社会学公式。在拉美，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不能纳入传统模式的人。无视拉美发展特点，就不能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洪流。卡尔梅科夫说，不能用呆板的公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因为这将使历史学家去寻求某种确定的形式。简单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进程，使学者们不能研究多方面的、矛盾的社会发展的所有因素。

（王起亮）